

中国共产党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档案文献选编

下 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 央 档 案 馆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档案文献选编

下 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 央 档 案 馆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四、大会讨论

（一）政治报告讨论发言

第三十号张国焘在政治报告讨论时的发言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同志们！政治报告的讨论，我要求大会分给我一点时间说话，我的说话，可分为四段。

一、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性质、阶段及其前途

世界上现在有两大营垒，革命的方面，是包含着苏联，先进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反革命方面，是世界帝国主义，和它的一切附庸。中国革命运动，就是世界营垒的一部分，这种理论，好像已为我们同志所了解。可是，当实际运用时，仍不免陷于错误的观念。在这世界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中，帝国主义是一致压迫苏联，和各国的革命运动的。苏联和各国革命运动，是一致反抗帝国主义的。若有人以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得到胜利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便没有胜利的可能。因此，我们可以不必着急的干起来。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是等待主义。另一方面，若有人以为中国革命，是中国自己的革命，是局部的革命，因此，以为帝国主义的势力无足轻重，这也是错误的观念，是“局部的革命论”。我们要有一个“整个的世界革命观”，这就是说：“中国革命应该与全世界革命一齐动作，一齐反抗帝国主义，以至一齐向帝国主义进攻”。国际代表^[1]同志说：关于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有两种说法：1.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力，因他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基础；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助力，因他是要把帝国主义驱出于中国之外。2.中国革命可以进展到社会主义，因此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瞿秋白说：这两种说法，应该是合并起来。我以为中国在目前这一阶段中的世界意义，仍然是第一种，因为现在还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的性质。第二种说法，是中国革命进展中的将来的世界意义。

土地革命与反帝国主义是互有关联的。反帝国主义是全世界革命阶级的共同任务。同时在前这一阶段中，中国革命负有土地革命的特殊任务。在谈话会中，有同志仍讲到：“如果太重视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其结果就是减轻土地革命，就是减轻阶级斗争”。这是武汉时代中央政治局中有人提议：“在上海发动一个第二次五卅运动，来掩护两湖的阶级斗争的激烈进展”。那个时候的提议人，有过这种错误观念。现在提议，不应忽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人，并不与武汉时代提议人的观念一样。现在的提议人，并没有把反帝国主义运动与土地革命对立，发表这样反驳的议论的同志，他们自己，到（倒）把反帝运动与土地革命对立起来。足见他们是具有忽视反帝运动的观念。现在的问题是忽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问题。中国的革命，在中国的意义，也和世界革命的意义

一样，既不是互相等待，也不是局部的革命论，要有一个整个的中国革命观。中国现在互相对抗的阶级：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地主豪绅、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为工人、农民及城市贫民。帝国主义是我们敌对阶级中的领袖，他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站在指挥的地位。在这种情形之下，不管你农村斗争做得如何彻底，等到农民的队伍包围了一个大城市，以至杀进城市里面来了，帝国主义一顿炮，就可以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所以城市工人的运动，要与农村的斗争互相联接起来。虽然我们可以说：土地革命即是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基础，可是，决不可忽视在大城市中以工人为领导，在政治经济上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反帝运动。即使农民斗争有大的进展，但是忽视了城市工人的工作，则中国革命势力仍不能成为整个的革命势力，而是零细的局部的革命势力。此种革命运动，必为农民意识所支配。中国革命史上的农民革命，如太平天国等革命运动，是纯粹的农民革命，在现代已有产业工人的中国，而且是半殖民地的中国，那么纯粹的农民革命，就变成局部的农民革命运动了。只有在土地革命与反帝运动的互相联系的进展中，才能达到更改土地制度，民族解放与统一和建立民主独裁的任务。

组织中国社会阶级的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封建军阀、地主豪绅、买办阶级、帝国主义。我们党，最初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后来革命运动发展起来，又加上打倒豪绅地主的口号。到现在，资产阶级亦在打倒之列。随着资产阶级的叛变，上层小资产阶级亦同时叛变了。在我们的敌对方面，拥有武装势力，经济力量，文化组织和政权。我们所有的只是人，在中国人口中占90%的群众。革命一步一步的发展，一步一步的深入，到现在占（站）在革命阵线的是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现在的情形，斗争是一天一天加剧，阶级的界限，也更明显的表现出来。彻底的土地革命，是农民斗争的出路，所谓各阶级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在客观上再不能有的。反帝运动是动员群众和领导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削弱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和打倒国民党。工农和城市贫民要起来，推翻现政权，建立他们自己的政权。这些方向，就是表示革命运动的深入。国际代表同志告诉我们：理论是节省力量的东西，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就是这阶级的对抗历史过程中的产儿，也可以说是阶级斗争的经验之总和，并不是什么别的神秘的东西。在争斗过程中，如果我们有理论，便可利用他，来观察敌人的力量，找出敌人的强点弱点和他们相互间的矛盾，并观察我们自己的力量强点弱点，和相互间的矛盾，来决定我们在某一阶段中的正确政策。因为革命进程的动的现状，所以视察易于不正确，视察不正确，便是错误倾向的来源。布哈林同志告诉我们，在目前这一阶级中，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的性质，动力是工农和城市贫民，任务是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统一中国，推翻现政权。并且告诉我们，这一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性质的革命可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的前途。我觉得经过布哈林同志的解释，对于我是很了解的。现在不能有别的意见，我不能有所增减。再重复一次，我们过去为什么错呢？为什么犯机会主义的错误呢？错误的来源和表现，总括一句，是在动的革命过程中，我们不能利用世界革命的经验 and 理论，来视察敌人和我们自己。

二、过去的教训

谈起过去的教训来，秋白同志对这问题既然谈得不少，我也来简单谈一谈。在这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战线争取领导权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是想把革命领导到资本主义方面走，而资（无）产阶级则想把革命领导向非资本主义走。我们在过去过程中，都分不清，还是我们迁就资产阶级呢？还是依时而放弃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呢？还是积极发展工农势力呢？还是随着小资产阶级动摇呢？关于机会主义的表现，布哈林同志明白指出几点：1. 中国共产党独立性不够，这是事实。

我们随时随地要有独立的政治主张，练习我们自己的领导能力，才能于紧急关头，表现领导作用。2.在历史阶段转变中，看不清任务，也没有准备，这也是事实。在武汉时期，我们的确没有看清我们自己的任务。既没有准备尽情打击豪绅地主，也没有在豪绅叛变时的紧急关头，给他一个的反攻，反而随着小资产阶级动摇，这就是不去预备包围敌人，而坐受敌人的包围了。3.所谓领导民众，我们是领导民众斗争，而不是防止民众运动，这本是我们固有的观点。那时竟有人谈出我〔这〕样的理论：“所谓领导民众，不但能领导民众向前，并能停止他，至必要时，还能拉他向后，这样才是领导民众”。不但有这样理论，并且实际去妨碍工农运动。布哈林同志又指出，我党指导机关知识分子太多，富有小资产阶级的意识，这都是事实。我曾说我们过去的错误，由于我们对于革命形势估量的不正确，和缺乏世界理论和经验，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霸占指导机关，我觉得布哈林同志所指示的并无若何冲突。布哈林同志解释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时说道：在武汉时代，即使我党的政策完全没有错误，也许会失败，不过我们采取了错误的政策，所以我们失败得更可怜和可耻，这样批评是很公平的。我们批评过去，须力求正确，不可有丝毫成见。

至于谈到在某一时期，和某种条件之下，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和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自最初到现在，大家都认为是正确的政策，并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在最初大家对于这种政策的观念，都是模模糊糊的，有许多不自觉的“左”倾或右倾的倾向。现在瞿秋白同志分析起来，说当时有两种不正确的观念，“左”倾和右倾，好像机会主义推进的两个轮子，都是机会主义的根源。陈家同志或许不太明了秋白同志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当时张国焘同志是代表“左”倾的观念，陈独秀同志是代表右倾的观念，这都是机会主义。可是秋白同志自己呢？他当时和独秀同志的见解完全一致。假使秋白同志要说别人脑袋里面有一个机会主义的轮子，那末，他自己脑袋里面，就有好几个这样的轮子。

现在我们先不妨说到几件具体的事情，来证明我的论据。第一件事情，就是国际联络委员会的问题。一九二四年夏天，谢持张继等国民党右派，搜到了一些青年团的决议和章程，这些决议里，写明C.Y.要在国民党的各级党部内组织自己的党团。如是，他们起初就找了胡汉民汪精卫和我党中央开〈始〉谈判，后来就把问题提出同年八月间国民党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讨论。结果，在那次会议中，决定国共关系的四条文件，前三条都是表面文章，第四条却是秘密的。一九二五年五月间，我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才看见，这第四条的秘密决议的原文，大意是说，“若说C.P.与C.Y.在国民党内有党团作用，则不难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设立一国际联络委员以管理之”。这条秘密决议原文内容是：由国民党派一代表，共产党派一代表，第三国际一代表，共三人组织成一国际联络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中央之下，其职权是所有第三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训令和文件，都交该委员会审查，国共两党纠纷问题，也交该委员会解决。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国民党要管理中国共产党的企图，这是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的行动，根本丧失独立性，而受资产阶级的支配呢？当时秋白同志是出席国民党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的，他并不是C.P.中央的代表，可是他竟代表中央与国民党代表签订这个条件。后来中央打电报到广东，不承认秋白签字的条件。这条件才事实上没有发生作用。我说出这件事，证明我们同志，那时的观念，是如何的不正确呀！

第二件事情，是上海谈判问题，在廖仲恺事件发生以后，把许崇智、胡汉民等都逐出广东。中央一部分同志，当时都有这样的意见，以为革命势力内分化太快了。后来在西山会议派开会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我党中央与西山会议中的退出派（孙科、叶楚傖、邵元冲）在上海曾开一次谈判，允许他们许多让步的条件，这当然是一个错误。我们事后都不满意这一谈判。广东省委和鲍罗廷同志当时都不满意那次谈判，可是他们的意义是完全正确的吗？这也不是事实。当我代表中央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到达广州的第一天，在陈延年同志处，即看见一个电

报稿子。这个电报稿子，就是预备打给汕头的我们在蒋介石第一军的同志，要他们退出第一军。我当时即把这个电报停止了，没有登出去^[2]。后来我问鲍罗廷同志，为什么要叫那些同志退出第一军呢？鲍罗廷同志说：蒋介石渐有离开我们的趋势，若我们同志退出第一军，可以使第一军发生动摇，我们退出第一军的政策，就是向蒋示威，使他感觉我们同志有在第一军的必要。可是这还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是向蒋介石的让步（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让步，使他来和我们一块反对西山会议派（豪绅地主买办的代表）。这个政策是否正确呢？这是否是争领导权积极政策呢？

第三件事情是三月二十日的事变。三月二十日事变，是蒋介石给我党和工农势力以及汪精卫等小资产阶级的一个打击。这是大家都明了的。可是，当时蒋介石的势力并不甚大，蒋介石谋叛的主力军，只有第二师第六团一团的兵力。黄埔学校的大部分学生，是反对蒋介石的，工农势力反对蒋介石，而且谭延闿、朱培德、李济琛等，也是反对蒋介石，而且谭延闿还预备积极行动呢！驻在汕头的第一军第一师——蒋介石的主力军——其中有两团是归我们同志指挥的，何应钦当时接着蒋介石解决我们同志的武装的电令后，经过十天不敢遵蒋令办理，反之我们到有解决何应钦的可能性。可是当时广东省委采取了让步政策，俄国同志也就随着广东省委而让步了。这个让步政策是否正确，现在还值得讨论。广东的意见虽然比较中央的意见“左”些，对于这个或那问题更有正确的观念，但是不能说广东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因此，我说当时大家的观念都是模糊不清，没有那（哪）一个一贯的正确的主张。党里面也没有形成明显的政治派别。虽然不断的发生争论，假使我们一定要去比较一下，陈独秀同志还算是有一个一贯的主张。

若谈到武汉末期的事件，这种错误的性质，就比从前的事态有些不同了。我们处在客观上的困难情形之中，我们常常觉得自己的政策的不对，但是常有人来安慰我们说：“现在让步不要紧，只要反蒋成功，就不成问题了。”所以这种安慰我们自己的理论和见解，是很多的。我们因为缺乏理论和经验，所以跳不出这个险要的环境，若说到错误的责任问题也是政治局全体应该负责的，以土地问题来做例。关于土地问题，同志们若说我没有深刻的研究，我是承认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中的土地问题委员会，我也没有参加，不知道详细经过情形。后来我党与国民党共同组织一个土地问题委员会，国民党竟把代表地主阶级的军官何健等参加这委员会，这显然是国民党的阴谋，使何健等与我们发生直接冲突。可是我们居然与何健等去讨论没收土地，这简直是与虎谋皮。这委员会的成立，事先我们并不知道，事后我们知道成立了这么一个委员会，我是很怀疑的。我又记得在某一次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席上，鲍罗廷同志发言说道：我们现在的重要事情，是要使我们的意见与共产国际的意见一致，就是土地问题。他说：他认为没收土地，是土地革命的完成，减租和反对豪绅等，是土地革命的开始，——要实际没收土地，还须要一些时候。接着秋白同志提出一个和国民党办交涉的土地政纲草案，内中并无没收土地的条文或字义。当时罗易——少年国际代表和任弼时，是反对没有没收土地的条文的。我们都是赞成秋白的提议的。我们赞成秋白同志提议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向国民党交涉没收土地是无益的事情。同时罗易等也没有提出切实的办法。后来决定推秋白、鲍罗廷起草一个电报打给共产国际，并大意根据鲍罗廷关于土地问题等的演说，和秋白的提议案，等候国际的电复。这个电报是否发出，内容如何，国际是否回电，内容如何，我都没有看见，通通不知道。

从这次鲍罗廷同志发言中间，我才知道我们与国际有不同的意见，究竟不同的意见在什么地方，意见不同的程度如何，我都不知道。秋白现在说：当时同志中有主张让步的，他主张仍是进攻，这完全不是事实。秋白当时与鲍罗廷、陈独秀的意见，是没有什么大差别的。许多文件，都是秋白起草的。和森的机会主义史中说的一篇集机会主义之大成的决议案，就是秋白起草的。汪精卫叛变后，秋白还起草了一篇要联络汪精卫的决议，那时秋白又是中央农民部的负责人，许多反

对农民过火的文件，都是由他起草，由他发出的。同时，秋白也和我们一样，不赞成独秀同志要枪毙汉阳没收工厂的工人，和惩办童子团的愤气语，这也是事实。这些事情，都是要大家负责任的。在五次大会后，我参加政治局会议，不过是很少的几次，没有写过一个决议案。我很可推开我的一切责任，但是有许多事情，虽然不是我的提议，可是有许多事情，我当时是同意的了，所以我也不能推开我的责任。假使有人有意的去推开自己的责任，这不是一个诚实的革命家应有的态度。总之，我们说过去许多的错误，是由于我们的幼稚，不自觉的，不能对革命形势有正确的估量，缺乏理论和经验，这是很老实的话。假使我们把事实颠倒起来，以推开自己的责任为目的，这样，不能得到过去的真正的教训。

三、八七会议后，对时局的估量和我党的政策

现在我首先要说一点八七会议以前的情形。在七月十三日，我党发表退出国民政府的宣言以后，有一天鲍罗廷同志就约了我与立三、恩来，维汉、太雷五位去开会议，他提议以我们五个人组织一个新中央局，独秀、平山、秋白、和森都派到莫斯科来。当时我即问他说，现在是非常严重的时期，你觉得这一改变是必要的吗？假使是十分的必要，我们是可以受命于危难之际来负责的。鲍罗廷同志即说：这是必要的，这新中央决定以后，恩来同志还同我说笑话：一定是国际有什么不满中央政治局的电报来，所以老鲍有这个紧急提议。我答他说：我也是如此猜想呢？当时任弼时听见这个消息。大家知道弼时是反对独秀的，因为独秀把他决议案撕碎了。（有人在下面叫：他是反对独秀的政策，而不是反对他个人的。）这自然弼时是反对独秀的政策，但是他那时还和我说：为什么不叫独秀出来做事呢。拿这一个例，就知道党内问题，是不能用不自然的解决办法。在这五人中央局成立后，罗米那兹来到汉口。他当时拿出一个国际电报，这电报里说：“共产国际曾电令中共中央，要遵照共产国际屡次训令的政策进行，否则就要公开批评了”……大意如此。我当时即说：我们并没有看见这些训令和电令，但罗米那兹，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一事实和发生这一事实的原因。大家知道当时我们是处在极严重的时期，罗米那兹既没有和我们讨论目前的许多困难问题，也没有要我们做一个报告，他要那时的政治局给一个严厉的命令给陈独秀同志。大意要他即刻来莫斯科，否则就要执行纪律。同时独秀来信请假一年。当时我们的意见，以为党内问题，不能这样不自然的解决，因为政治的错误还没有分析清楚。假使邀独秀同志到会，共同讨论过去的政治错误，他如果承认过去的错误，那末请他到莫斯科来，即使他不承认错误，也是有办法的。过去的错误，是大家要负责的，就是独秀要多负一点责任，政治局其他同志，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问题是在谁能看清过去的错误，和忠实的接受国际的新指示。罗米那兹当时表示不信任我们，又不和我切实商议这些问题，逼得我们向〈他〉提出三种办法：1.请他兼代中央执权，其他同志帮他做技术工作。2.由他指定一个新中央，3.由他指定C.Y.中央，暂行代理中共中央职权。后来我就奉命到南昌去了。这是转变中一点实际情形。

我并没有参加八七会议。直到十月初到了汕头，才看到了八七会议告同志书。我当时即去信中央临时政治局，表示我完全赞成“八七”告同志书，并且表示如果你们认为我有错误，要处罚我，我是完全接受的。

现在再说到八七会议后的一些问题。

1. 不断革命论的问题。在十一月扩大会议席上，罗米那兹提出这个问题时，可以说大家都不明白不断革命论的内容。只知道这种理论是谈中国革命是含有社会主义的性质。那末，我们就应该提出，“没收工厂”这一口号。于是，秋白等赞成提出没收工厂的口号。又有人说：没收工场这一

口号太抽象了，在实用时，应该具体化。我接着说道：假使我们在原则上决定了没收工场的口号，没收大企业固然不用说，若是其他小企业也要没收，那我们就可以提出“车子归车夫工会管理”和“商店归店员工会管理”这一类的口号，作为鼓励更广大的群众的口号。当时大家都说这一类口号可以用的。事后秋白就大做其文章，想从这一点，证明我是少数派，或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我想这是太张大其词了。这种说法，虽然是错误的，但是问题的重心，仍然是不断革命论和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而不在这些错的说话。现在我们听了布哈林同志的报告，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比较得明了些，对于从前我们的错误见解，只能说是大家都是一样的。不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不可以拿一二句话来张大其词，为攻击个人之用，因为每一个同志都要养成诚实的态度。

2. 暴动政策问题。关于暴动问题，布哈林同志已经说得很明了，现在不妨再说一点。八七会议后暴动政策进行的实际情形。一九二七年七月间，我党与国民党在武汉分裂时，我们即采取了反抗武汉国民党的精神。但是，如何对抗国民党呢？还是联络国民党所谓左派（反汪精卫的左派）来反对汪精卫的武汉政府，还是反对整个国民党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反对国民党的行动，不是和平的反抗，而是武装的反抗，我们通常叫他是暴动。不管他是暴动也好，武装政变也好，军事行动也好，其目的在于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当时的问题就是如何反抗了。我们常说八七会议有如何的意义，但是八七会议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八七会议是挽救党于向国民党让步的政策，进入反抗的政策，他重振了同志的精神，这是他的重大意义。可是他也有错误，我说他有错误，你们不应[认]这样想，说我是反对八七会议的重大意义的。我并不是这样想的。秋白同志说：八七会议前后的革命潮流不是高涨，也不是低落，是中间时期，也是集合我们自己力量的时期。我在谈话会上说：在八七会议前后，我们以为立即就可以推翻国民党政权，在这不正确估量之下，忽略了巩固和扩大我党在群众的基础，和由半公开工作转入地下党工作的种种准备。秋白说：当时须要整理工作，那在事实上，与我的意见有什么大的冲突的呢？

再说，“八七”后的几件暴动的事，a. 南昌暴动，b. 两湖的秋收暴动，c. 广州暴动。我在去年十月间到上海后，会见秋白，他和我谈到党的情形，他谈话的内容，尽是暴动问题，我当时即怀疑，我问我自已，为什么尽是暴动呢？难道没有一点旁的工作吗？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因为假使你说现在暴动不能够，或是表示怀疑暴动，那么机会主义的罪名，马上就可以加在你的头上。同时我才到上海，一切情形都看不清楚，所以也不能有一定的意见。

说到南昌暴动，在政治谈话会上，恩来同志说，国焘企图联络张发奎从武汉一直动摇至南昌。秋白在他的报告中，也是如此说的。在武汉讨论南昌暴动时，曾有加伦、罗米那兹、恩来和我到会。开会时我曾提出去湖南的意见。加伦说：还是到广东东江好，有两个理由。1. 东江方面军事空虚，2. 那里农民颇有势力。当时我就说：若说到农民势力，湖南农民势力并不差，而且尚未冷火。往广东如何与两湖秋收暴动相联系呢？所以后来中央说：南昌暴动是两湖秋收暴动的一部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没有去湖南，十月间我在香港会见罗米那兹，他说他也有错误，也许去湖南就好了。在武汉时，我曾问罗米那兹，南昌暴动的意义如何，他回答说：国民党太压迫我们了，假使张发奎又叫我们同志退出他的军队，那末，我们非干一下不可。我又问他，用什么旗帜呢？他说：还是用国民党的旗帜。关于南昌暴动如何暴动，用什么政纲，政权组织的形式如何，是没有讨论的，更没有决议。在我去南昌那一天，我们曾开过一次会议，在这会议上，罗米那兹说：共产国际来了一个电报，内容是说：南昌暴动若无胜利的希望，则不如叫我们同志退出军队，送他们到工农中去。加伦报告说：他早上会见张发奎，张发奎已经同意他的军事计划。就是他的

军队不再东进，停留南浔路一带，逐渐向广东进发。因此，加伦主张我们和张发奎一同到广州，到广州后，再行与张发奎分化。在两个条件之下：1. 不东征而回广东。2. 张不迫叶挺退出他的军队或退出C. P.。他又说：同张发奎到广州有二利：1. 军力较大，可以击破敌人军队，实际到达广州。2. 经过二个月的工作再在广州分化，我们可以多分化张发奎的一部分军队。因此，他的结论是到广州再和张发奎分化。他们两人说完话后，大家都没有发言。罗米那兹也没有表示不赞同加伦的意见，他一句话都没有说。他向着我，要我到南昌去送信，我当时不肯去。后来，秋白、维汉说，这件事关系重要，还是你去一趟罢。我就是奉这个使命去南昌的。现在我们有三个暴动——南昌暴动、两湖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都失败了，因此就发生一个问题，就是：这三个暴动，能否同时并举呢？或者其中的两个暴动同时并举呢？这就是说：或者南昌暴动与两湖秋收暴动发生联系，或者南昌暴动与广州暴动合并，成为在广州之行的一个暴动。假使其中的两个暴动同时并举，其意义必更大，成功的可能性也较多。我的意见：南昌暴动与两湖秋收暴动发生联系，换句话说，就是决定去湖南的方针，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政策。其次就是把南昌推迟到广州举行，问题就在是否可能。事实告诉我们，在张发奎军队中的教导团，在南昌暴动，我们与张发奎决裂后，一直保存着到广州暴动，成为广州暴动中的支柱。假使我们不在南昌暴动，或者张发奎要撤换他军中的几个C. P.分子的高级军官。但是，他没有法子根本去掉我们在他军中的根本势力。现在大家可以想一想，可否将南昌暴动推迟到广州举行，大家可以自己去答复这个问题。

潘家辰：你去南昌，是不是专去送信呢？

我去南昌，当然不是专去送信，是去参加讨论是否在南昌暴动的，岂有中央委员专去送信的道理。当时若不在南昌暴动，推迟到广州举行，广州有大的工农群众，加上一个较大的军事势力，比较更有成功的可能性。这一问题，现在还是值得我研究的。再者，南昌暴动，并不是完全由C. P.决定的，是我们与贺龙的军队合办的一个军事行动。虽然有他的政治意义，但他的本身仍然是个军事行动。贺龙军队，是无纪律的，是流氓无产阶级性质特别浓厚的军队。他军队的行动，时常影响我们的实际政策。南昌暴动后即有蔡廷锴军队的叛变，当时恩来同志做前敌委员会的书记，这一点是要恩来同志负责的。在汕头枪毙了三个抢东西的工人。现在我们要问一问，恩来同志当初是否知道这件事情。（恩来——我知道的，后来我提出来说过不要单处罚徐光英，但扩大会未同意。）同志们批评我，说我在南昌暴动中对张发奎问题发生动摇，这是我不能承认的。而且问题不能如此提出。关于没收二亩亩以上的地主土地，虽然不久就由我和彭湃同志提出没收三十亩以上的地主土地，但是当初我是赞成〈的〉一个，这当然是一个错误，我应该负责的。这是关于南昌暴动，我所要说的一些主要问题。

两湖秋收暴动的内容，有许多地方，是一些定期的预约的命令的暴动或骚动，C. Y.代表说得很老实，他说：我们当时不知道什么是暴动，怎样暴动，只是党的命令到了，就骚动一下，这就是暴动呢！现在我没有时间去详细批评秋收暴动。但是秋白同志说，两湖秋收的暴动是真正的暴动，这未免不正确罢！

广州暴动，是有很重大的意义的，我们对于广州暴动，是很爱惜的，不忍加以深刻地批评。但广州暴动失败以后，各地仍然是不断的暴动，盲动主义就发生了。在中央的报告中，说盲动主义是由各〈地〉党发生出来，中央是最先纠正的。如果没有某种政策之不正确，何以会有盲动主义的事实发生。中央又何从去纠正盲动主义？必然先有了不正确的政策，然后才发生盲动的倾向，如是才有零零细细的纠正。C. Y.代表说得好，他说：我们当初不知道什么是暴动，什么是盲动，我们的确是把暴动当成一个普通的罢工看待，而又把暴动看成是群众运动达到最高度涌来的暴动。又怎样叫他不盲动，不军事投机呢？我是同意于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

的。有些同志似乎不愿意我赞成国际决议案似的，说我是投国际的机，又说我是陈独秀派。（秋白——谁说你是陈独秀派？）自然有人说，但是这都是废话。我赞同国际决议案，有我在去年十二月间（广州暴动失败后）给中央的一封信，今年一月间中央召集的一次谈话会的发言可以证明。在我去年十二月间给中央信中有四要点：1.帝国主义的势力，不应忽视，统治阶级虽不能稳定，但群众有组织的力量甚少，党的力量也薄弱，现在要注意领导群众斗争，以训练组织群众。2.要有群众的布尔什维克党，须与群众发生密切联系，而且在群众建立基础。3.注意秘密工作问题。4.反帝国主义和民权主义的斗争，是发动群众的。这些建议，是否是机会主义，可是中央没有发表这信件，也未加以考虑。一月间中央召集的谈话会上，秋白、恩来出席，讨论革命潮流的估计问题。秋白说：“革命潮流一直高涨”，我说：革命高涨已过，现在是斗争剧烈的时期，革命潮流是停滞（停滞决非是停止的意义）状态。是否立即从上涨，或往下落，须看我们的政策而定。因为当时中央根据革命潮流一直高涨的估计，曾制定湘鄂赣四省割据的计划。我就问，假使要实现四省割据，中央的意思是否从已有的苏维埃区域发展起来？假使是的，海陆丰为何不向外发展，李济琛现在要清乡了，我们要注意。少奇同志当时说：中央政策，是先有暴动政策，在暴动政策下，临时去找一些群众，而不是有了群众，因而发展出来的暴动。章龙同志说，现在我们的工作，从大城市跑到小城市跑到更小的城市，跑到偏僻的乡村，这不足以证明革命高涨。这些很有价值的意见，可惜未蒙中央考虑。再说，中央当时做些什么，可以说是个暴动编辑部，天天做暴动的计划，假使是做科学的暴动，编辑部还可以。可惜还是文学的暴动编辑部。中央说不信任群众是机会主义，信任群众是好的，可是要正确的信任。看看现在群众怎样。好，信任群众的一些C.Y.同志，他们在上海向工人宣传暴动，工人回答他说：我们没有力量，没有武装，怎样暴动。他们得到这个回答，他们以为群众不革命了，他们就发生消极的观念。其实，那（哪）里是群众不革命，而是我们没有找到动员和组织群众的正确方针与方法。自发的暴动，我们是应该去领导的。但是，不可勉强制暴动，假使这样，就会变成盲动。我说上海有些罢工，我们没有去领导，这是可耻的。并不是说处处的群众运动，都要我们去指挥，但是在上海的罢工，那我们是要想尽办法去领导呀！

有许多工作，是不能取放任态度的，我在上次政治谈话会中，已经指出一些事实。这些事实，是很多的，如上海工部局增加华董问题，中央没有领导起群众来认识帝国主义收买中国资本家的政策。工人向国民党要求，恢复工会自由的运动，我们也没有去领导参加，黄平同志说得很老实，“不错，这些都要做，但是，怎样做法”，这可以回答说，只要有正确方针，方法是比较容易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我在上海某一工人区域的一条马路上的墙壁上，看见那里有一百多（条）标语，是由二十多个同志用粉笔写的。可是，这些标语，都是“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帝国主义和苏维埃万岁”，这些口号固属好，但是，这都是通常的，而不带时间性和煽动性。为什么对于目前斗争问题，不可写些标语呢？即此一点，可以看出不是不能做的问题了。

党的改组，带着许多形式主义，这也是事实。例如八七会议中，派彭公达同志做湖南省委书记，他是知识分子，不是工人和农人同志，这与提拔工农分子无关。我当时听他做湖南省书记，我是素来知道这个同志的，他是一个好同志。但是，能力很薄弱，我是很替湖南工作担忧的。后来湖南事件中，许多错误，多因他的能力缺乏以致误事，也是一个原因。又如罗亦农同志，在湖北工作时，的确有些错误。同志中有半数反对他的。但是亦农同志在湖北还做了一些工作，而特别委员会更忽略了对工作的指导，因此使同志失望。从前反对亦农的同志，都不满意特别委员会的工作了。这样使湖北党部的纠纷加甚，工作受大损失。提拔工农分子，这是很好的，没有人反对的。但是，必须党在工农群众中有基础，尤其在工人中，才能更提拔多的工农中的积极分子。我举出这两件事实，证明在党的改组过程中，不免有些不自然的现状，形式主义的现状。

上面这些错误，是在我们将来的工作中，所不可不注意的。

四、对于革命形式〔势〕的估量和我们的任务与中心工作

同志们！我的时间很少的了，我不能再很详细的说。关于革命形势的估量问题，在秋白的政治报告中，虽然比他从前的意见算是修改了许多，但是他的估量还是不正确的。许多重要问题，他没有答复。他分析统治阶级的政权，不能稳定，我是同意的。但是，布哈林同志说：敌人的力量加强了，而且他们压迫我们是一致的，这一重要论据，他没有答复。在事实上看，从前香港与广东是冲突的，现在香港英帝国主义与李济琛是共同压迫广东工农的。上海工部局与蒋介石，联络共同压迫共产党与工人阶级，上海中英日纱业资本家，最近联合一致，对付纱厂工人，这些重要事实，是不可不注意的。而且在他的报告中，特别在他的书面报告中，描写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但是，没有举出充分的事实。反过来说，我们到（倒）可证明，他所举出的事实，有许多是夸大的。例如说武昌纱厂工人起来杀死了几个国民党工会的改组委员，当时群众并没有积极参加。杀死这几个国民党员后，群众都吓跑了。（有人说：武汉代表跑了，群众到（倒）没有跑。）这是不足为奇的，这是当场指挥人的报告。在白色恐怖压迫之下，群众还没有充分的勇气，这是很自然的状态。我们不是在群众大会中，做煽动工作，在决定正确政策的会议中，必须要有事件的真相。又如说奉天大刀会举事，悬挂红旗，他们的举动，并没有与我党发生关系，他们举事，悬挂红旗，是他们的习惯。假使我们夸大的说，他们是已经赤化了，这是自欺的。我曾举出重要现状说：“我们现在与群众隔离”，秋白同志也没有答复这一点。在一月间的谈话中，我说我们要去动员和组织群众。秋白说我是否要取消革命，是否要先组织后革命，这种反对彭述之的口吻，不能拿来反对张国焘。广州许多工会甚至反对工会，都被李济琛封闭了，工人的工资甚至减低一半，工人是必定要起来反抗的。上海工人的大部分，捐一天工资给蒋介石完成北伐和反对日本。天津工人对于冯玉祥还有许多幻想，这些都是党应当极端注意的。整天说暴动，暴动，占领城市。假使你不领导广东工人，力争恢复工会和从前的工作条件，在这些斗争中，领导工人反抗国民党和李济琛，团结他们于共同目标之下。假使不这样做，又用什么方法，可以占领广州市呢？有的同志说，党的力量，现在是削弱了，但是，是否削弱了，秋白同志也没有答复。假使不答复这些问题，对于时局的估量就不能正确了。对于我们目前的任务，就不能彻底的认识了。

秋白同志现在还不肯放弃他一省或数省直接革命形势的说法（甚至说一县或数县的直接革命形式〔势〕，这种说话是笑话），以为用农民游击战争，可以包围一大城市，而成为割据局面。中国历史告诉我们：洪秀全时代，可以由乡村起来夺取大城市的政权，辛亥革命时代就不同了。辛亥革命，不是用农村革命势力包围大城市的革命形式，而是由大城市起来的兵士兵变和群众沸腾的革命形式。现在我们不能再用农村革命包围大城市的革命形式的观念。我以为发动农民暴动并不困难，但是使农民暴动或骚动有大规模的组织性，而且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是不容易的，更需要我们多的努力。如果以农民来打城市，即使现在农民打到了广州市，假使他缺乏组织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是否农民会将广州市烧掉呢？所以我们现在在农民中的主要工作，是以正确的土地政纲，去发动广大的农民，使农民的争斗扩大，而且深入，而不是在一个小范围内，专门做平分土地的事情。因为土地平分不容易做到，而且不是一个好办法。这也是要大会来解决的。

同志们！我的时间没有了，许多问题我不能说到了，只好很简单的说。现在大家都说兵士运动很重要，的确很重要。广州有二十个兵士支部，人数不到一百人。这只能说是兵士运动的开始。中国军队，是雇佣性质，是流氓无产阶级的成分，是很容易去破坏的。这一运动必须与农民运动

发生极密切的联系。

宣传和煽动的工作，过去是没有做得好，假使我们同志去散传单，稍一不慎，就要牺牲性命，但是所散的传单，仍然为群众所不懂，这是不值得的。我们必须注意宣传和煽动工作的通俗化，以及他的内容，必须是使群众能最受感动的。

同志们！对革命形势的估量，和我们的策略与任务，不仅仅是新方法问题，而是整个的政治路线问题。我们要夺取广大的群众，来实现武装暴动推翻政权，实现我们这一阶段中的任务。我们目前要在日常政治经济争斗中，动员和组织千百万群众，要在反帝国主义运动，和争自由的运动中，团结广大工农群众，并领导城市贫民反抗一切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政权。以正确的土地政纲，去发动更广大的农民而深入土地革命，进行兵士运动以摧毁反动统治的根基。一切宣传和组织的工作方法，都要适合于这一新方针，而且只有在这夺取广大群众的过程中，可以形成一个群众的布尔什维克党。这样一个党，才能领导广大群众，达到最后的胜利。

注释：

[1] 指布哈林。

[2] 伍豪按：当时电报已发出了，意思是在向蒋介石示威而另行发展与左派合作的军队，在蒋的军中仍保持能秘密存在的党员。后因国焘同志代表中央不赞成此事，粤区委乃又电止此行动。我当时在汕头所得的实际了解和经过情形是如此。

根据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刊印

第二十九号蔡和森在政治报告讨论时的发言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同志们！

我今天发言，尽四十分钟时间，于万不得已时，再请求大会延长发言时间。现在讲第一个问题，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及任务。关于目前阶段估量，在国际代表同志报告里，在白^[1]同志报告里，在焘^[2]同志报告里以及发^[3]同志报告里，大概有三种不同的估量的样子。现在要把问题首先弄清楚，我的意思有两方面：第一要问什么是革命高潮？革命高潮有什么条件？第二要问什么是革命低潮？革命低潮有什么条件？我以为革命高潮有四个条件。

第一，有全国普遍性，比如五卅运动。“五卅”在上海爆发，即影响长江流域，而两湖、四川、珠江流〈域〉，而广州香港及北方各省，而京津、满洲里，所以五卅运动是革命高潮，因它是全国的普遍性的，非局部的。这是革命高潮的第一个条件。

第二，有相当持久性，就是说不是运动今天起来，明天就会打倒，或者上星期起来，这星期就打倒，像五卅运动，坚持三月之久，不是三天或一礼拜的运动，以地域来说，非是这里起来，那里被打倒，非是某一地的单独运动，比如“五卅”在上海起来，香港即发生总罢工，天津组织总工会，一直影响到满洲里，在长江流域运动更加普遍，运动爆发非三两天的事，持久到三月之久，非是上海打倒，香港起来，非是香港打倒北方起来，而是有相当的联续和持久性，这是革命高潮的第二个条件。

第三，运动发动于大的城市，而且是城市工人的领导，非是单独爆发于乡村。比如“五卅”时上海起来，于是广州、香港、武汉、青岛以至天津，最大的工业中心和最稠密人口的城市亦起来。不仅有乡村运动，主要的城市成（为）运动的发动和领导，这是革命高潮的第三个条件。

第四，我们力量在阶级关系上可以对敌人维持优势，使敌人不得不取相当让步。比如五卅运动是取得相当胜利，虽然帝国主义有大炮，有陆战队，可以继续屠杀，但是我们广大群众，有广大群众的力量，使英帝国主义不得不采取让步政策，不能进攻，我们对敌维持优势，这是革命高潮的第四个条件。（同时又可引俄国1905及1917二月与十月以至法国1789和1848年大革命来证明其具这些条件）。

现在拿上面四个条件：有全国普遍性，有相当持久性，运动发动于主要大城市和我们力量对敌维持优势，来观察现在中国局势。（注意：这种仅是说拿上面条件来观察现在的局势，而不是要机械的用这些条件来推测将来的高潮。）是不是革命高潮呢？就是说是不是存在有上面的形势呢？即以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近各处澎湃的农民运动而论，是不是革命高潮呢？这显然还并不是的。

第一，没有全国普遍性。如果广州暴动胜利，那一定是全国性，那一定南方各省农民运动更强大有力，那一定有五卅的形势，那一定有北伐的形势。

第二，没有持久性。广州暴动胜利只持续三天之久，没有如五卅运动维持三月，形成全国革命高潮。

第三，没有各大城市发动，虽然广州是大城市，但只有广州，无别的城市之继起，无别的有相当群众基础的城市起来。

第四，在势力与关系上，我们没有对着敌人维持相当的优势，可迫得敌人失败或让步。广州失败后，全国反动力量一致团结向我们进攻，虽然这次暴动取得相当结果，是不可否认的。

从上面所说来看，“八七”以来不能说是一直高潮，只是旧的高潮趋于结束的过程；另一方面看，即不是高潮，是不是低潮呢？从武汉政变和国民党决裂到现在，是不是革命潮流低落呢？这里首先要问什么是革命低潮？有什么条件是低潮？看中央十一月会议决议说革命低潮的条件，在于：1. 资产阶级军阀统治的稳定。2. 改良政策之得以实现，就是说统治阶级，南京国民党新军阀的政府能解决社会矛盾、阶级冲突。3. 革命群众的分裂和失败。就是说群众失败，工人离开，农民离开我们，在这种情形之下，群众如已离开我们，要它再起来，是困难事（事情）。有些条件，是革命潮流低落的表现。在白同志报告中对低潮条件中曾指出：

1. 广州暴动失败非全国失败，非最后一次失败；
2. 广州暴动之后，不但农民未离开，工人未离开我们，且相当的跑到我们这边来；
3. 广州暴动取得新的军事经验；
4. 广州暴动失败后，非仅全未脱离暂时经济恐慌，且长期经济恐慌，不能用改良方法来和缓革命。

上面所指的不是什么新的，与中央十一月会议所指低潮三个条件，内容无大变化，拿这些条

件来看现在情况,是不是革命低潮呢?据中央政治问题和秋白的分析结论说:仍是“一直高涨”。这种分析,我觉得不妥,是没有明确的观点。为什么中央政治局和秋白同志有这种分析呢?这种分析是从不间断革命的理论来的,什么是不间断革命论,和其对党的影响以后再说。其实中央十一月会议所指出的三个条件和秋白所指出的四个条件,只能用以论证中国革命向前进展和高潮有再来之可能,而不能用以论证现在是一直高涨。从这种分析,论证革命不会停止且继续前进,用这种分析去反对取消派的观点是对的,这是非常马克思主义的,非常辩证法的,假使以此为一直高潮之论证是非科学的,非列宁主义的,我以为应如国际代表同志所说现在革命形势既非高潮亦非低潮,而是两高潮之间的中间形势。这样分析,是非常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非常辩证法的,对于革命潮流估计大意是如此。

再说革命潮流一直高涨与直接革命。从“八七”到现在,中央政治局维持革命一直高潮的分析,这种分析是非列宁主义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不间断革命论的分析,是在“八七”后大毛子罗米那兹同志发明的,“八七”以来党所采用的。我所说当然非反对罗米那兹同志个人。他个人于“八七”以来很有功绩,但他所发明的不断理论是根本错误的,这种理论可从中央文件看到。

“八七”以来中央采用这种理论,没有摇动过,这次中央报告仍是一线的,在秋白的报告中到处找得到这种理论。现在仅举一个文件为例:在中央十一月扩大会议决议中,都见不断论的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否认有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只认为有单个资产者,没有整个阶级。十一月决议上有一段说:“从中国社会的各阶级间看来,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制度的历史的改革意义上,是最幼稚的,最薄弱的,最无能为的。”是“历史上未成熟的流产的胎儿——中国资产阶级,他一定不能组织自己的政党,自然也就(达)不到什么确定的有原则的政纲”。这就是说中国资产阶级,不仅是胎儿,且是未成熟的流产,根本否认有资产阶级的存在。

第二个特点,否认中国资产阶级有反革命的作用,否认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胜利。毫无疑问的自上海武汉政变以来,在上海、武汉、广东的屠杀,在其他各地的屠杀,试问一问,中国资产阶级是不是有一点成绩?广州暴动失败后杀了多少人?马日事变又杀了多少人?各地革命运动受反动势力何等的打击?这是不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一点成绩?罗米那兹同志抹杀一切说毫无一点成绩。其次只说反动营垒内的分裂崩溃,而没有团结集合的可能。我们看四月和七月政变以来,反动势力的范围缩小抑是扩大?在未反动前,我们未失败前,反帝国主义的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维持着对敌相当优势,后来不仅小资产阶级跑开了,即兵士、小商人亦走到反动营垒去了。如果反动势力范围缩小,那它的团结范围也要缩小。事实上不是这样,反动势力的范围的确是扩大,不是缩小。

第三个特点,农民的观点,中央十一月决议上说,“现在中国所有各省农民的怒潮的高涨,就是这中国革命不断性的最好证明”。这就是不断论的革命的社会基础。不断革命论社会基础,建筑在农民不断暴动的观点上,这里理论非罗米那兹个人的,而是领导和指挥全党,联(连)我自己也包括在内。这种理论,支配着“八七”以来党的政策路线和党的组织路线。这种理论一系统下去,因而估量中国革命有一直高潮说法,这样所得的结论,是不是科学的?是不是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辩证法的?不是的。因为革命潮流不是按照一个直线进行的。结论的根(本)性适(是)违反辩(证)法的。这样分析,将使我们找不出斗争的要点,找不出每个转变时期策略运用的基点:那时应进攻,那时应退守,都无一定了。这种理论下来是唯心论,唯心论的分析在秋白口头报告中即表(现)出来。如同说假使估量现在革命潮流在两个高潮之间,结果会走到怀疑上去,会这样怀疑:高潮几时来?是不是没有高潮呢?像这样说法表现唯心倾向,他以为如不估

量革命是一直高潮，会有右倾的危险，这是不对的。右倾危险，取消主义的各种倾向，非是主观的维持高潮，或“一直高潮”论所能挽救的；右倾危险非唯心论的分析所能预防的。事实上恰恰相反，因维持这种分析，这种估量，反使党的领导摇动，非发生机会主义危险，即要发生盲动主义危险，使全党同志不知怎样退守，不知策略运用，这样可使党消灭，使革命再遭几次大的失败，对于这点是应该唤起大会特别注意的。

第三是要说到直接革命形势的问题。自然有了刚刚所说的那些革命不间断的理论，革命是一直向上高涨，各地的农民爆动是继续不断的发动，所有（这）些，都会成为一般直接革命形势的证据。秋白同志的意见，自然会认定是一直高涨的革命了。但反对这种意见的人，例如国焘同志，他是完全否认一切真革命形势的。因此，大会对这问题，应该有正确的决定。我想要决定这个问题，应该首先问到，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到底有不有一定的范围？这范围是包括整个全国而言，或是仅仅指地方的部分的而言？是应该建筑在农民的暴动基础上，还是要建筑在全部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基础上呢？这些很简单明了的问题，我想是谁也可以答复的。另一方面，中国革命还有他发展的特性，这就是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在估量革命形势上，当然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如果忽视了这一点，的确可以使我们走到极左或回复到极右的道路上去。的确，我们看到了有些地方的革命发展是向高涨的，如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各地的农民斗争及情绪的高涨，和敌人方面的士兵开始部分的跑到我们这边来。这许多的事实都可以证明有些地方的确维持着直接革命的形势，有些人完全以盲动主义去否认这些斗争高涨的形势，当然是不对的。可是这是不是说全国范围内有直接革命的形势呢？事实告诉我们是没的，而秋白同志他却说有的，这就是他的“唯心论”所分析而得的结果。自然我们如果说完全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是不对的，是要走到极右倾的道途上去。但是绝对不能认为是全部的直接革命形势，因为如果是这认识法，我们就只有是立即暴动，我们就不能不走到盲动主义上去了。

现在要求讨论秋白同志书面的及口头报告中的阶级关系分析是不是对的。我可以说秋白同志的分析方法，完全是八七会议以后的不断论的分析，偏于否认敌人的力量和作用，只有看见敌人的弱点没有看到敌人的强点，只有估计自己的强点，没有估计到自己的弱点。这种观点的分析，是非马克思非列宁主义非辩证法的分析。这种分析的方法，可以说“八七”以后，支配了全党，我自己当然也在其内。我以为大会应该与这种不正确的非马克思非列宁非辩证法的分析方法作（奋）斗的。中国的俗语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本来不是马克思的话，可是他的意义，在估计作战的胜败时，实含有马克思的观点，我们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在与敌人斗争时，我们一定要能够估计敌人的强点和弱点，我们也应该估计我们自己的强点与弱点，如果我们忽视这些，就不啻帮助了敌来消灭自己。我们在秋白的报告中，只看到敌人如何薄弱，如何不能稳定，如何的他们的改良主义不可能等等。我们从没有看到他说到敌人攻下了北京以后，阶级关系的变化会怎么样？中国革命的形势转变又会怎么样？在洛阳事件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会怎么样？中国革命的形势转变又会怎么样？关于这些大的事变方面，总的趋势估计方面，秋白在他的口头报告，或书面报告中的确回避了抛弃了。我们在秋白的报告中，只得到一个很普通的简单公式（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是成了事实，但我们不要忘记他们中间的矛盾，他们当然不能够统一中国）。这种普通简单的公式，谁也不会否认他的，可是我们要问问敌我的对比究竟是怎样？反革命势力的团结是向强的方面抑是向弱的方面？我们应该采用的新策略是些什么？这里就实在没有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答复，这里实在不能使我们很有保证不再走到机会主义或盲动主义的道路上去，要保证不要走到歧（歧）途上去，就只有要更明白的指示出来斗争的总形势，仅仅一点简单的公式是不够的。另一方面，秋白又没有指明我们自己的强点和弱点究竟在甚么地方？我们有的是什么？

我们缺的是什么呢？在他的报告中最回避最忽略的就是大工业区域大城市的真实情形，完全没有说到。在这里当然要承认党在“八七”后，我们有伟大的成功，取得了〈对〉农民群众的领导，取得了许多农民成分的党人。可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城市不能与农村发展作对比，城市方面，除广东外，其余可以说都消沉下去了。这些重要问题，秋白都把他丢掉了。试问忽略这些，怎能了解目前的中心任务？怎能决定我们现在的策略？虽然，秋白也说过要注重群众，但完全没有说明此问题的严重的实际状况和意义。这样，必然要使同志不能明白国际决议中所谓夺取千百万群众的重要。现在的问题不只是照着国际决议唤几声争取千百万群众的口号就够了。

说到党的任务。刚才我们已把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说过了。在这里我要首先提出两个问题来要求答复：第一，是暴动策略的路线是不是要根本取消？这问题是要请国焘同志答复的。

（国焘说：同意布哈林同志的意见）第二，要问怎样去暴动？暴动的意义现在是怎样呢？是不是像秋白同志所说的暴动是夺取群众的方法？这当然不是的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暴动意义是应更进一步的了，我们现在说的“暴动”是要最后的打倒敌人，推翻敌人的统治，使统治阶级再也爬不起来，也就是说我们要获得最后的胜利。到底以后要怎样暴动呢？是不是继续做不准备的暴动？只限于农民的暴动，盲动主义的暴动、命令式的暴动？不是的。然而这种不正确的暴动倾向，这种盲动主义的危机现在难道完全没有了么？不！还正在发展。秋白说：“盲动主义的危险现在已经减了，请布哈林同志放心”。这是不对的，我的意见与他相反。我以为大会应与这新的危险倾向——盲动主义，严厉的奋斗。关于这点，以下讲到党的倾向时再说。

说到群众运动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规定一个大概方向就够了，也不仅拿国际决议案之所指就够了，而且要在策略上组织上和工作方法上很具体的讨论出系统的路线，国焘在谈话会上说到所谓少数运动。立三、秋白反对所谓合法运动。（国焘是不承认这个名词的。）关于此问题隐隐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但皆未把他们的路线充分发表出来。其实这问题是很重要的，不仅是一个夺取群众的方法问题，而且包含不同的政治倾向的问题在内。我自己尚没有固定的意见，因为时间所限，说滑头一点，到将来第二次、第三次说话时再来讨论。（大会笑起来）

现在来说第二类问题，即过去的教训。这一点，布哈林、国焘、秋白都说得很多。秋白与国焘同志所说，我是有点不同意的。关于过去理论方面的教训，他们算是说了一个大略。我现在说一说当时的事实，即机会主义在武汉时代之一的经过。首先我要声明的，我是犯过机会主义错误的一个。我今天是向大会以“机会主义者”的负责资格来说明机会主义的一般经过了，而且偏重于武汉时期。在此以前的错误只附带说明一二。秋白以为机会主义是从第三次大会发生的，因为第三次大会为了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有两个不同的倾向，就是一主张加入国民党，一反对加入国民党。其实事不完全如是。因为第一，自从两（西）湖会议（1922年8月）以后，经过很坚决的反对李汉俊、陈公博、施存统等的不加入国民党的观念，到三次大会时，对于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已经不成争论的问题，所争论的是关于C.P.政治面目和劳动运动的独立性。当时孙中山对国际代表马林说，中共如加入国民党，就应该不能另有共产党存在。马林的意见，只要孙中山能接受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什么东西都可以归给国民党，因此有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当时我们要问一切劳动运动，是不是也归国民党？我们对各种政治问题，可不可以单独发表宣言？依马林，这都是可以归国民党的。独秀及秋白同意于马林的，我和国焘反对得很坚决。因为当时的劳动运动，都是在我们的领导之下，认为这是取消C.P.存在的主张。马林、独秀等在解释此策略的理由时，确是很右，对于工〈人〉阶级势力和C.P.之存在是很悲观的。我们听了以后，益发加紧反对。秋白以为是先有“左”的倾向以至引起右的倾向，这与事实是相反的。第三次大会闭幕时，还有一个废督裁兵，开国民会议的问题。我主张用C.P.名人（义）单独发宣言，马林开始还不甚赞成。可见当时的